

孫文生前死後

● 李遠榮

真正生日短缺十天

孫文誕辰，國家定為公曆十一月十二日。但真正的生日，卻是公曆十一月廿二日，相差十天。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據孫文手書自傳稱：他是「姓孫名文，字載之，號逸仙，籍貫廣東廣州府香山縣，生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，農曆十月十六日」。

又據孫文元配夫人盧慕貞女士的證實，確定他的生日是在民國前四十六年（清同治五年，歲次丙寅）十月十六日。

所以，孫文誕生之年，為公曆一八六六年。當時農曆十月十六日，應是公曆十一月二十二日。

民國十三年舊曆十月十六日，是孫文五秩晉九壽誕。這一天正好是當年公曆十一月十二日。孫文家屬是以農曆生辰稱慶，而政府方面，祇承認公曆，於是就把這一天（十一月十二日）定為國父孫中山誕辰。這樣，就一直沿用至今天了。

其實，在新舊曆推算方法，應該以孫文

誕辰那一年推算為準的；但國民政府誤把一九二四年的舊曆十月十六日，當作一八六六年的舊曆十月十六日來推算，錯把孫文的公曆誕辰定為十一月十二日。

總而言之孫文的真正的生日應是國曆十一月廿二日。

名字有十六個之多

孫文的名、字、號究竟有多少？那當然無確鑿之統計。不過，已發現的就有十六個之多。孫文，字逸仙，中山是他的別字。這三個名字是中外人士、政府常用慣稱的。外國均習慣稱呼他為DR SUN YAT SEN（孫逸仙）。因為他曾是醫生，所以，在名字之前，冠以醫生銜頭。中國人則稱之為孫中山，還冠以「先生」尊敬稱謂。「中山」兩字，是他三十歲以後，在日本題筆書寫的名字。

孫文十八歲到香港讀書，先進拔萃書院，後入皇仁書院。這時均以「日新」為學名。是指日日新之意。「日新」典故出於「易

經」：「日新之謂盛德。」「大學」亦謂：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」

皇仁書院業師慧眼

孫文在皇仁書院後期，受業老師區鳳墀為他改號為「逸仙」。後轉學西醫學院，即以「逸仙」之名畢業。故孫文之畢業證書上，寫的是：孫逸仙。外國人常以孫逸仙醫生稱之。

我們不知道孫文的業師區鳳墀是否是北方人，操的是北方話？區師給孫文所改之號，「日新」與「逸仙」在音調上完全是同一北方口音，只不過將「日新」改為「逸仙」字體而已。

其實「逸仙」更有詩意，而且在意義上，這是超逸常人天之聖者也。

區師早就看出孫文才氣之非凡，所改之號，預卜孫文前程，如「日」之「新」昇，光芒萬丈，以至超「逸」常人之聖「仙」。果然，孫文為道之至尊者，為國之上父者，預言與事實相符也。

宋耀如談話的震撼

宋耀如是孫文的好友，不僅在財力上對孫文多有幫助，而且思想上也給孫文很大影響。他們的第一次見面就很有意思。

一八九四年，孫文（當時還沒有「中山」這個號）由同鄉友人陸皓東陪同到達上海。陸也是宋耀如的朋友，通過陸的介紹，宋、孫心儀已久，所以雖然初次見面，卻如老友重逢一般親切。宋耀如問起孫文和陸皓東、楊衢雲等人搞的輔仁文社的情況。孫文說，他和楊衢雲意見有分歧，他想成爲第二個洪秀全，楊衢雲則反對他稱王，爲此他們常常爭得面紅耳赤，有幾次甚至動了武。宋耀如如在美國度過了青少年時代，深受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熏陶。他聽了孫文的話笑道：「小心！說不定我也會和你打架的。」走到家門口，宋耀如突然搶上一步，伸手做出攔阻的姿勢，笑嘻嘻地說：「想當洪秀全第二者禁止入內，欲做中國之林肯者歡迎作客。」

「那我們就來一場檀香山摔跤！」孫文立即奔到門前的小河邊，抓起一把濕泥在自己嘴上抹了一下，又遞到宋耀如面前。宋耀如會心地笑一笑，也用泥在嘴上抹了一抹。這是在夏威夷流行的一種角鬥方式，它的規則很奇怪：不看誰被摔倒，而是以先發出聲音者爲輸。

孫文雖然年輕，卻不是宋耀如的對手。

宋耀如施展出當年在美國海軍中練就的格鬥本領，連連把孫文摔倒在地。但是孫文有一股不肯服輸的倔強勁兒，摔倒了爬起來就是不出聲。廝鬥中，宋耀如忽然發現，孫文身後有一口糞池，只要再後退一步就會跌下去！他急急，脫口叫道：「當心！」孫文立即狂喜地抱着他大嚷：「你輸了！你先出聲，你先出聲！」

晚上，宋耀如設家宴爲孫文洗塵。席終人散，孫文向宋耀如透露了此行的目的——北上天津，上書李鴻章。他認爲朝廷若能採納他的革新主張，或可挽狂瀾於既倒。

「中國需要華盛頓、林肯，而不是公車上書！」宋耀如說：「不錯，可是誰能當中國的華盛頓、林肯？」

「你！你有志當洪秀全第二，爲什麼不能當華盛頓第二、林肯第二？」

孫文語塞了。

這一夜，宋耀如向孫文大談林肯，反反覆覆講林肯關於「民有、民治、民享」的主張。宋耀如雖然摔跤輸了，但是他的一席話卻給孫文極大震動。

清廷惡意寫作孫文

孫文西醫畢業後，即返廣州，以「孫文」之名行醫，但又與「逸仙」之號並用。

孫文曾上書給李鴻章總督，書中即以「文」自稱。這時及革命勝利以後，孫文常在

題書寫匾，以及公文中，多以「孫文」簽署。在廣州的中山紀念堂的「天下爲公」匾額，南京中山陵的牌坊橫額上的「博愛」，及北京碧雲寺裡的「中山衣冠塚」大堂的石刻「總理遺囑」簽名，均以「孫文」自署。而孫文題書祝壽大天堂壽匾書「壽」字，所題下款亦爲「孫文」。

乙未（公元一八九五年）。廣州第一次革命失敗後，清廷懸賞花紅緝捕孫文，在該緝捕書上緝捕首犯「孫汶」。把「文」字寫成「汶」字。當時香港總督府受清廷壓力，張貼同樣的緝捕佈告。並在「華字日報」登載緝文，都是按清廷佈告一樣，寫成「孫汶」。

清廷也常以「賊」、「匪」污蔑孫文。故在緝捕書文上，稱之爲「匪首」、「匪犯」，甚至「廣州灣海賊」。

武昌起義後，建立國民政府，那些反對派如袁世凱、陳炯明之流，也將孫文稱之爲「孫大炮」，此屬惡意的攻擊稱呼。

父母取名才逾奇聖

孫文年幼入塾時，叫「德明」和「帝象」。時人馮自由在「革命逸史」中稱：孫總理幼名德明，字日新，別號「帝象」。

孫文之名「德明」，這是他的「譜名」。所謂譜名，即家譜中的排行是也。家譜中每一世代，都有一個共同的譜字，或在上，或在下，以示共世兄弟也。孫文的共世譜名

為「德」字。所以，孫文的長兄名「德彰」。二兄為「德佑」。孫文為「德明」。皆以「德」字排行，位於上也。

「德明」，是孫文父親命名的。意取「大學」首句：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」。「明德」與「德明」，其意思是一樣。因為德字排行在上，故以「德明」稱之。「明德」，「顯明其至德也」。「德明」，也是指「至德於顯明也」。此「德」字，盛德之謂也。「易經」述及「日新之謂盛德」。孫文初名「日新」，乃父取「德明」與「日新」是有同義之意，可謂巧妙之安排也。

至於「帝象」，是孫文之母楊太夫人所命名者。孫母以「帝」字命名於第三子，冀有朝一日，出人頭地，不為將相，而為帝王。說來楊太夫人願望之高。可謂至上矣。

「象」者，與「像」同，貌也。此豈非以「帝」之貌「象」視之乎？況且，「禮記」謂「南方日象」。此亦預兆也。孫文生於南方，孕育於南方。而南方又是革命策源地，首次廣州起義，策劃於香港，革命烽煙始於南方，此豈非帝出於南方乎？由此可知孫母奇聖之才也。

改良唐服中國韻味

孫文的形象，有其獨特之處，使人一看便知曉這是國父孫文。

孫文個子不高，但肩顯闊大。其頭額正如清廷緝拿令中所形容：「額角寬大」。辛

亥革命前後，開始留著「八字」鬚鬚。平時常常穿著的唐裝，人皆稱之為「中山裝」。

原來八十多年前，孫文在日本時，看到日本學生所穿的服裝簡單樸素，且方便、靈巧、大方，便將這種學生裝的領子和口袋等部份加以改革，成為單立領，前身門襟九顆扣子，左右、上下四個明袋，袋褶向外露，後身有背帶縫，中腰處有一腰帶，這便誕生了最早的中山裝。

辛亥革命後，關於革命黨人該穿何種服裝引起過爭論，有的主張戴瓜皮帽，著長袍馬褂，也有人主張穿西裝。孫文卻認為穿當時廣東流行的便服，將直領改為翻領，既方便又經濟。服裝師根據他的建議，設計出一種四個衣袋的翻領上裝，孫中山帶頭穿。於是人們就稱此服裝款式為「中山裝」，並一直沿襲至今。

中山裝在國際上被稱為中國男式禮服的代表性服裝，同中國婦女們穿的旗袍一起被視為國服。它質地面料高中低檔均可，因此為各界男士青睞。中山裝給人以莊重、儒雅、挺拔、幹練之感，頗有中國韻味。

勸兄勿沾政治舞台

孫文所書「天下為公」，不是為「私」。而是以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。「公」之為畢生宗旨，孫文為了統一

中國，建設中華，以國及民之大局著想，於辛亥十二月廿五日清帝退位後一日（廿六日

），即向南京參議院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，並推舉袁世凱代替。此豈非為公報於天下乎？

尚有一事，可見孫文毫無私情，不搞裙帶風之精神。

廣東省都督胡漢民，本是一九一二年四月廿八日，由廣東省議會推舉出來的，當時廣東各界有人提議，舉孫文之兄孫德彰為都督，孫文在南京知道這件事，即寫信給他哥哥，勸他千萬不可接受，信中說：「粵中有議舉兄為都督，弟以為政治非兄所熟悉，兄質直過人！一入政界，將有相欺以其方者。未登舞台，則眾人厚望，稍有失策，怨亦隨生。為大局計，兄宜專任所長，專任一事：」

信中又說：「且聞有欲用強力脅迫他人以舉兄者，以此造因，必無良果，尤不可避也。」

可見孫文大公無私的偉大精神，國人對其崇敬之一斑也。

中華銀行軍票總裁

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，舉國響應。是年十二月廿五日，孫文自海外歸來，上海各界人士熱烈歡迎。

有記者問他：「您這次帶多少錢回來？」蓋風聞孫文帶有巨款回國建設也。

孫文坦然曰：「我所帶回來的是革命精神。」

一九二二年元旦，孫文在南京宣誓任臨時大總統職，國號為中華民國。其時，民國肇造伊始，財政困難重重。

滬軍都督府乃決定籌設中華銀行，推舉孫文為總董，滬軍都督府財政總長朱葆三等為董事。

中華銀行發行的軍用鈔票，起初信譽良好，全國通用。

熟料南北議和，政壇動盪。同年六月，起了風潮，朱葆三等向承裕、恒祥等錢莊借款，竭力維護這種軍用鈔票的信譽。

軍用鈔票於十一月由江蘇省財政廳批示限期收回。

孫文辭去臨時大總統職由袁世凱任大總統，朱葆三亦辭去滬軍都督財政總長之職。

一九一三年孫文討袁失敗出國。中華銀行改組為中華商業銀行，繼續營業，由朱葆三任總董。

兩夫人外兩位太太

一般人只知道孫文有兩位太太，一位是盧夫人（盧慕貞），是二十歲時結婚的。另一位是宋夫人（宋慶齡），結婚時孫文五十五歲。

除此之外，孫文還有其他太太，一位是陳粹芬，是孫文在日本及南洋越南時的妻子，革命期間，她常為同志們洗衣煮飯，十分辛勤。

另一位，據日本共同社報導，日本教授

久保田，在橫濱發現了孫文的七十八歲女兒宮川富美子。這女子的母親，就是孫文的日本太太，名字叫大月薰。一九〇一年，當時孫文三十六歲，這位日本少女是十四歲。她父親是做中國生意的商人，孫文藏身在她家中，四年後，孫文向她求婚，結果成親。

普陀志奇留給佛山

一九一六年八月廿五日。孫文乘坐建康艦駛到了普陀島。適逢北京法源寺沙門道階，遂由道階導引上島，逕往普濟寺。

普濟寺是全島供奉觀世音菩薩的主刹，巍峨莊嚴，金碧輝煌。普濟寺主持和尚了余，聞訊大開山門迎接。

了余陪同孫文一行遊覽了海印池、康熙為皇太后祝福的御碑亭、多寶塔等名勝古跡。

孫文興致勃勃，一邊遊覽景觀，一邊聽了余和尚談論佛理。了余和尚說：「南海為菩薩現相之場，善眾皈依之地。德慈航於彼岸，結寶筏於迷津，証普渡之慈緣，顯弘深之願力，皆觀音之佛力也。」

孫文笑著說：「有信仰即生力量，吾深信其固然。譬如革命者信仰革命主義，終至於推翻帝制創建民國。但佛教之信仰，只能自求心靈上的解脫，固無救國民於水火、登國民於衽席之大力量也。……」說罷大笑。

了余也微笑合十，連呼「彌陀佛」。二人談笑風生，隨行者有胡漢民、鄧家

彥、朱卓文、周佩箴、陳去病、任光寧等。他們從法雨寺旁小徑登上佛頂山，進慧濟寺小憩後，上了天燈台。

天燈台海拔二八〇公尺，處普陀全島之巔。台前林木蒼翠、雜樹繁花，清風徐來，夾帶著陣陣幽香，沁人心脾。孫文面向東方，居高臨下，凝望海景，頓覺心胸開朗，萬念俱寂。正轉身返回慧濟寺，忽然眼前一亮，見慧濟寺前恍惚矗立起一座絢麗而高聳的牌樓，仙葩滿屋、寶幢舞風。牌坊內處有奇僧數十，隱然簇擁，似乎在迎送客人的樣子。孫文正驚訝間，又見牌樓上懸有一座巨型的輪盤在快速地旋轉，光芒四射……

孫文來不及細細思量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那奇景倏然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孫文急忙詢問同行諸人，但大家都說沒看見。陪同導遊的了余和尚對眾人說：「這是菩薩靈驗，貴人慧眼方能得見。」孫文聽了搖搖頭說：「我不信佛，但確實看到奇景。」他把瞬間所見重又述說一遍，自信地對陳去病說：「該是海市蜃樓吧！請你代我寫一篇遊普陀志奇，留給佛山作個紀念。」

孫文一行路過小徑到法雨寺。小坐之後急匆匆地去了梵音洞，轉回普濟寺晚餐素齋。在方丈室休息時，陳去病將寫好的「遊普陀志奇」送給孫文過目。

孫文接過細看，這是一篇由陳去病撰稿並用他的一手蘇體小楷寫就的文章。他輕聲地讀著：

「余腦素無神異思想，竟不知是何靈境！然當環眺乎佛頂台時，俯仰間，大有宇宙在乎之概，而空碧濤白，煙螺數點，覺生平所經，無似此清勝者。耳聰潮音，心涵海印，身境澄然如影，亦既形化而意消……」

孫文看罷全文，在文末蓋上了他的長方形「月白風清」陰文篆印。重閱一遍後，他又在右上角蓋了邊章，鄭重地放在屋的四方桌上。

在普陀山錫麟堂坐關的太虛和尚，聞孫文來到普陀並有此奇遇，作了一首詩贈孫文

卓犖風雲萬里身，
廿年關係國精魂，
舒來日月光同化，
洗出湖山看又新；
佛法指歸平等性，
市民終見自由人，
林鐘送到歡聲壯，
一若豪吟起比鄰。

孫文應太虛和尚之請為太虛詩集「味庵詩錄」題寫了書名。

智識價值高於技術

在中國民間有流傳著許多有關孫文的故事，惜無系統整理，僅藉此羅列三事。

孫文曾對人說，知識的價值，好像是很抽象的，其實它比一般體力勞動的價值更大。他舉了一個生活中的實例：家裡的自來水

管壞了，打電話請廠裡的人前來修理。修理工來了，這邊摸摸，那邊看看，過了好一陣子才在一處動手處理了一下，自來水就嘩嘩地出來了。問他要多少修理費，他答說一元二毛。又問他，你一下子就修好了，為何收費這樣貴？他說：我察看花了好多時間，主要靠我的技術，才能找到毛病。我收費的標準是技術知識一元，修理手續二毛。

八字生辰革命第一

民國二年，孫文討伐袁世凱，失敗後，避居日本。當時有些人對革命前途感到渺茫，缺乏信心。其中有幾個青年相信算命，想

知道孫文的出生年、月、日、時，所謂「八字」，藉以推算他的命運要到何時才能「否極泰來」。於是就委託一個人去問孫文的「八字」。孫文聽後，很生氣，對那人說：「你們年輕人怎麼這樣迷信，難道我的八字不好，你們就不想革命了？你回去說，我的八字就是一定要『打倒軍閥，繼續革命。』」

孫文在上海時，一次要出去開會，但離開會時間只有十分鐘，極為緊迫。準時到會，是他堅守的信條。因此，他鄭重地對開車的司機說：「必須準時趕到！」司機點了點頭，立即開車。孫文知道車子通過南京路，到開會地點最近。不料司機沒有走南京路，反而走別的路大大的兜了一圈。他在車裡直對司機生氣，但是當汽車到達開會地點時，剛好是十分鐘。孫文因此問司機：「開車的

路線為什麼要捨近就遠？」司機回答說：「南京路雖近，因人車擁擠不堪，車子難行，一定遲到。向外繞行，路遠些，車子卻快速無阻，反可早到。」孫文聽了，甚為嘆服。以後，常以此事教育部屬：指揮革命工作，在任務交代清楚之後，該信任他們能夠發揮聰明才智去完成。

病榻談話首次公開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「孫中山先生集外集」，書內收入了孫文的病榻談話，這一珍貴史料過去從未公開發表過。

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，宋子文、孫科、孫婉、鄒魯、汪精衛等受國民黨所托，至孫文病榻前請求留下遺囑，當時談話由汪精衛作了紀錄，在場者均簽了名。病榻談話如下——

孫說：你們有什麼話說？

汪說：中西醫屢次通知我們說，最好是先生在平安無事的時候，和先生說幾句話，我們以為先生吩咐我們的話，不知何時才用得著，我們一面抱著希望幫助先生戰勝病魔，一面仍然想得先生吩咐我們幾句話說。

孫說：我以為沒有話可說，因為病好了，還有話說，死了還有什麼話說呢？

汪說：同志要本著先生所定的宗旨來做事的，如果先生吩咐同志幾句話，可以增加同志無數的勇氣。現時先生抱病好了之後，至少要靜養一年、半年，在這時間，先生吩

附同志幾句話，也是必要的。

孫說：你們想我說什麼話呢？

汪說：我們把先生常說的話，寫出來了，重讀一遍。

孫點頭說：贊成。又說道：你們如此顯明是很危險的，因為政治的敵人，現已預備著等我死後，便來軟化你們，你們如此強硬堅定，必然有危險的。

汪說：我們不怕危險，我們一定要照宗旨做去。

孫說：我贊成。

汪說：夫人侍奉先生病，如此盡心，我們同志很敬重她，又很感激她。萬一先生有什麼意外，我們同志定然要盡心保護她的安全，只是先生也要安慰她幾句。還有先生的兒女，我們也擬了一篇說話，照讀一遍。

孫閉目點頭說：贊成。

汪說：先生可否簽字。

孫說：現在還用不著，等幾日以後，你拿來我簽字。

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四點二十五分。

孫文始終不忘北伐，以推翻北洋軍閥的統治。一九二四年九月，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。十月下旬，傾向革命的直系將領馮玉祥發動了北京政變，推翻了直系軍閥政府，並電請孫文北上討論國事。十一月十日，孫文發表北上宣言，主張對內召開國民會議，結束軍閥統治；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。由於多年艱苦的革命工作，孫

文勞累成疾，已患有肝癌。十一月十三日，孫文抱病啟程北上。當天午後一時，孫文偕夫人宋慶齡等在萬餘群眾的夾岸歡送下，乘永豐艦離開廣州大本營，十四日抵香港，旋即轉搭日本郵船赴上海。在滬居留六天後，隨同人員分成兩支，孫文偕宋慶齡、李烈鈞、戴季陶等乘日本郵船上海丸取道日本轉赴天津，汪精衛與大部份隨員則先行乘輪赴津，在津拜訪軍閥，洽談國是，等待孫文的到來。

孫文在北上途中，到處受到人民的極大歡迎。在上海碼頭，歡迎的群眾有萬餘人，齊聲高呼「打倒帝國主義」、「打倒軍閥」的口號。路過日本各地都有成千上萬的華僑和日人，鑼鼓喧天地歡迎他。到達天津時，碼頭上迎接的群眾達兩萬人，很多市民自動懸燈結綵，燃放鞭炮。

孫文是在十二月四日午後一時抵達天津的。船將靠岸時，孫文站立船頭，脫帽與前來歡迎的兩萬歡迎者相見，群眾歡呼跳躍，氣氛十分熱烈。段祺瑞的代表許世英、徐樹錚和張作霖的代表張學良也前來迎接。下午二時，孫文在汪精衛的陪同下，接見了張作霖的代表。

孫文是帶病北上的。這次北行，舟車勞頓，訪客演講，已經十分疲勞，再加上抵達天津時又是冬季，天氣寒冷，他卻脫帽站立船頭，與前來歡迎的二萬人相見，所以，到達天津當夜，就感到身體發冷、發熱、肝部

劇痛，臥床不起。

其時，段祺瑞政府派了葉恭綽、許世英二人為代表到天津，孫文在病榻上接見了他們。當

他得知段祺瑞要「外崇國信」和召開「善後會議」的活動，完全和他的反帝愛國主張背道而馳時，極為憤慨，立即對著兩個代表嚴厲斥責說：「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，你們在北京，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」在孫文的凜然正義面前，葉恭綽、許世英二人不敢作聲，好久，才靦顏地勸孫文不要太過「激烈」，免得激怒了東交民巷的「洋大人」，引起帝國主義干涉。孫文氣憤地回答說：「假如不推翻帝國主義，我就不革命了！」這樣，孫文的肝病加劇了。

這時，北京各界紛紛派代表到天津敦請孫文入京。而侍護的同志也都認為在天津張園治療很不方便，主張到北京協和醫院去治療。孫文同意了眾人的建議。

十二月卅一日，一個寒風凜冽的早晨，孫文乘專車，在宋慶齡、汪精衛等的陪同下前往北京。專車到達北京站時，受到北京各界群眾十萬人熱烈歡迎。孫文在車站發表了書面談話，表示「此來不是為爭地位，不是為爭權利，是特來與諸君救國的」；認為「中國人的自由平等，已被滿洲政府從不平等條約裡賣與各國了，以致我們仍然處於殖民地的地位，所以我們必要救國」。隨後又發

表了『入京宣言』，重申了書面談話的內容。由在廣州發表的『北上宣言』到在北京發表的『入京宣言』，都貫串了孫文的反帝救國思想。

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，侍護同志延請西醫為孫文診治。一月四日，繼續延醫會診。一月廿六日，入協和醫院施行手術，結果確診為肝癌。

廿七日，協和代理院長劉瑞恆關於孫文病情致孔庸之（祥熙）函如下：

「孔庸之先生轉孫孫先生家族暨國民黨黨員諸君鑒：孫先生入本院即發覺所患為肝癌最末時期，為不治之症。經於剖割及癌之外皮用顯微鏡考察證明，診斷為確。病狀自不好而至極不好，余等以孫先生之生存為無希望矣。協和代理院長劉瑞恆二月十七日下午十一時」。

孫文北上前，曾預定在北京大學禮堂演講。此時因病不能前往，乃委託汪精衛代表演講。

汪共演講兩次，第一次博得北大師生千餘人的熱烈歡迎；第二次，北大教授、學生多停課前往聽講，其他大學的師生也都聞風而至，達萬餘人，禮堂內外甚至操場上也擠滿了聽眾。他的演講詞鋒銳利，充滿感情，宣傳了革命主張，贏得了各界的支持和擁護。

孫文病倒時，一刻也沒有放鬆革命工作。當時北京政府異常混亂，他命汪精衛召集

北方同志舉行會議，討論北方政局，以決定國民黨的政治態度。於是汪精衛召集了丁惟芬、戴季陶、張繼、李石曾等十一人舉行會議，討論了約法問題、國會問題、統一問題、善後問題，力主北方一切問題，應由國民會議解決，無另行召集善後會議的必要。孫文在病榻上擬訂了召開國民會議的草案，派遣幹部到各省宣傳國民會議，發表聲明，接見來訪客人，處理公文，還向廣州寫信指導軍政府的工作。

一九二五年初，帝國主義乘孫文北上在北京患病之機，慫恿和支持盤據在廣東東江的軍閥陳炯明進攻廣州，企圖推翻廣東革命政府，於是廣東革命政府組織了東征軍，舉行東征。三月七日，在黃埔學生軍和東江農民的配合下，東征軍克復潮安、汕頭，陳炯明逃往香港。

其時，孫文病勢垂危，猶念念不忘革命工作。在他逝世前兩日的三月十日，當他獲悉東征軍克復潮、汕後，十分欣慰，立即指示電告留守府代行大元帥職權的胡漢民「不可擾亂百姓」。

孫文病重之時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在北京的委員只有汪精衛、戴季陶、邵元沖三人。

為加強國民黨在北方的力量，孫文乃加派于右任、吳敬恆、李石曾、陳友仁、李大釗五人為政治委員，設立北京政治委員會。一月二十六日晚，政治委員會舉行會議

，討論總理病危及逝世的善後問題，大家都認為應在總理病危之前，請他立遺囑，使革命同志能有所遵守，但為免使孫文消失精神抵抗力，決定暫不直陳，只請求醫生在病危時據實相告，以便請孫文遺囑。因此，國民黨政治委員會經常在北京飯店秘密集會，經過十多天的討論，擬成草稿，由汪精衛抄錄。二月二十四日，又請在北京的同志二十餘人參加修改，再由汪精衛抄錄定稿。

二月二十四日下午，汪精衛接到了醫生的通知：如欲問先生遺言，應乘早行之。汪立即召集同志商議。這就是前述孫文病榻談話的由來。當時同志徵求孫夫人同意暫離病房。

「……先生自知不起，乃令人將上月二十四日所預備之遺囑進呈，由夫人扶腕，用鋼筆親手簽字，既而呼和平、奮鬥、救中國者再」。（見葬事籌備處關於孫文病逝世記述，一九二五年三月）

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，在家人、同志環集下，孫文溘然長逝。

德醫克禮關於孫文病逝世之報告如下：

「孫博士今晨九時三十分安然而逝，神志清明，臨終不改。昨日下午發表其對於諸事之最後囑咐，並曾告孫夫人，願如其友人列寧保存遺體，已移至協和醫院施行保存手續。克禮醫生三月十二日」。

四尊銅像遷址之謎

孫文逝世後，日本友人梅屋莊吉，不願當時日本政府「禁止為孫文造像」的禁令，變賣妻、女首飾及家產，集資十萬元（相當於現在三億日元），為孫文鑄銅像四尊。

第一尊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鑄成，高二·九米，重一噸，演講姿勢，一九二九年三月四日運上海，六日運南京，安放在黃埔路中央軍校。一九四二年，汪偽為籠絡民心，移奉新街廣場中心。第二尊安放在廣州黃埔軍校舊址。第三尊安放在廣州中山大學新校址。第四尊原安放在中山縣中山故居，七七事變後，遷澳門「國父紀念館」。

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是孫文誕辰二〇周年，五月南京市當局正擬修繕銅像；六月，文化大革命風暴陡起，八月，圍繞銅像的保護與破壞，正義與邪惡進行了一場傳奇式的較量。

八月廿七日，一些造反派要搗毀銅像，

中外雜誌社稿約

- 一、本社園地公開，歡迎名人傳記、軼聞趣談、真實傳奇、中外古今、現代史話、回憶與隨想、醫學新話、科技新知等作品。
- 二、來稿請用稿紙繕寫，字體力求工整清晰，附照片插圖尤佳。
- 三、有關外國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，一律請加註原文。
- 四、來稿以白話文為限，對中外名人傳記，以近代現代人物為主，對傳主直稱其名，單名連名帶姓，不稱公稱考，稱先生，不空格，不抬頭，以突破時空限制，除特約稿件外，請勿超過五千字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）。
- 五、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。凡經由作者委請本社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，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，本社交由「聖文書局」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，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。
- 六、本社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本社編輯委員會及作者本人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
- 七、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、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。本社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，為精益求精，必要時將予刪改，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。
- 八、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（請自行影印留底），來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。

在像上貼出「勒令」：「限廿四小時內拆除，否則一切後果由市委領導負責」。市委接國務院保護令，決定將銅像移奉中山陵，工人們奮戰十八小時，完好無損地將像拆移到特製車上，時已凌晨兩點多。正欲啟運，忽然有人高叫「就地銷毀」，並夾著「市委要交出匿藏銅像的幕後指示人」等口號。好在主張堅決保護、反對銷毀銅像的人更多。管理處乘大辯論之際，即按原定「先南行，再東折北、再東引至中山陵」之迴曲路線，進行實地偵察，未見異常。誰知正欲開車之際，突然傳來「警報」：原定存放銅像的音樂台附近有造反派在游動。情況突變，天已大亮。怎麼辦？

工人們當機立斷，決定出奇制勝，改變存放地點，放棄原來的迴曲路線，直線高速疾駛，二十分鐘後至靈谷寺，速將銅像藏在經堂後的小倉庫內。不料第二天發現三百多

人分散在靈谷寺周圍。為確保安全，工人又連夜裝車，開進車庫。到第三天深夜，將陵園管理處人事檔案室的隔牆拆開，速將銅像移放安妥，重新修好隔牆，做好偽裝。雖然造反派一再尋找，終因保護嚴密而未發發現。

一九六八年六月，按周恩來指示，將銅像安放在中山陵南端原紫銅寶鼎處。警衛戰士在像上掛一大牌，大書毛澤東語錄：「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」，以保護銅像。

因為在那個年代，紅衛兵把毛澤東捧為神，毛澤東的話就像聖旨一樣，是不可改變的，因而銅像得以保護下來。

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，孫文逝世七十年，有關部門將藏經樓修葺一新，闢為「中山紀念館」，將銅像安全地移至藏經閣樓前。